

江苏省出版科研论文集



江苏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编辑工作委员会 编

江苏省出版科研论文集

(一)

江苏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省出版科研论文集(一)

江苏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徐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1 字数101,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 7-214-00099-7

C·3 定价: 1.55元

责任编辑 芮德发

编 辑 说 明

江苏省出版科学学术研究论文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论文集分一、二两集，第一集汇编编辑方面的论文20篇，第二集汇编发行方面的论文23篇。从全国来看，我省的出版科学学术研究起步较迟。近几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我省出版系统也面临着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搞活，这就必须努力形成有利于出版工作改革、搞活的理论指导，就必须对出版事业与出版工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这本论文集，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阐述了编辑体制改革的做法和经验；新形势下如何确立编辑意识；编辑工作在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编辑提高图书质量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分析。这些论文，对研究和探索图书出版规律、改革出版管理体制、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搞活图书出版事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热忱地欢迎全省出版界的同志，积极撰写稿件，广泛开展出版科学学术研讨，为进一步繁荣江苏的出版事业共同作出努力。

江苏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1987年12月

目 录

及时改革图书编辑部门的三级审稿制 ——关于编辑体制改革刍议之一	高 斯 (1)
新形势下坚持编辑职业道德问题 ——关于编辑体制改革刍议之二	高 斯 (15)
开发集体机制的强大活力 ——关于图书编辑体制改革刍议之三	高 斯 (30)
选题是图书编辑的工作基础.....	高 怀 (48)
谈编辑过程.....	缪咏禾 (56)
编辑工作中的选题决策.....	蒋才喜 (67)
抓好编辑工作重要环节 提高图书质量	王 章 时 勤 (74)
试谈组稿与作者工作.....	曹一鸣 (77)
编辑加工科技书稿的体会.....	徐步政 (86)
新兵谈编辑.....	陈天授 (90)
漫谈江苏版图书的地方特色.....	薛正兴 (93)
从编辑《江村经济》谈图书的质量、特色和效益	高 怀 (102)

做好科技图书的催化工作.....	蔡克难(105)
解放思想 坚持特色	
——《金圣叹全集》编辑出版工作记述	
.....	黄希坚(108)
试谈点校本《水经注疏》及其出版.....	张惠荣(111)
试论连环画读物的商品属性及其供需变化	
.....	华士明(117)
图书的盈与缺互见.....	周 行(125)
谈谈政治理论刊物的经济宣传.....	蒋青萍(132)
美术编辑知识结构我见.....	程大利(138)
谈科技期刊编辑队伍的建设.....	周玉炯 王 遐(147)
编辑与自我意识.....	朱建华(152)

及时改革图书编辑部门的三级审稿制

——关于编辑体制改革刍议之一

高 斯

(一)

面对时代潮流，总结历史经验，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努力创建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图书编辑学。这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

完成这样一个开创性的任务，当然困难不小。尤其是关于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图书编辑学？如何构筑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等等大问题，需要从容进行研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定论。

但是，有一点是否需要明确起来？即：我们所要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图书编辑学，应该是一门侧重于应用的科学。因为，暂且撇开给它提出的若干规定性不谈，就“编辑学”而言，它的理论体系，它的各条原理，恐怕都得从我国编辑图书的实践经验中来提炼不可。而建立这门学科的目的，无疑主要地又在于指导图书编辑工作的发展与提高。认定它是一门应用科学，看来是适宜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图书编辑学，在当前，最大的困难，还不是如何设计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或者对某些概念能否作出确切的定义，而是我们不能较快地总结出足够形成社会主义图书编辑学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我国已经有了长时期的出版事业的实践，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现代革命出版事业的实践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经验，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图书编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实践经验不仅本身很重要，而且可以从中引申出对社会主义编辑学的认识与构思。然而，它们毕竟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实践。而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只有三十多年的历程，中间还要扣掉十年动乱时期遭受严重摧残所造成的停滞不前，看来是不太可能满足完备地建立社会主义图书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需要的。况且，出版事业的全面改革正在进行中。有些方面的改革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就整体而言，出版事业的改革还处于起步的阶段，今后的路程还相当长。改革无疑将提供极为丰富、极为有用的新鲜经验，但要获得足够的经验还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实践。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图书编辑学，可是我们的实践经验还远远不够。这就是横在我们研究工作前面的一大困难。

在这样一个难度很大的困难面前，当然不能望而却步。我们应该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争取及早取得丰硕成果。同时，在当前大好形势下，通过改革，尽可能为创立社会主义图书编辑学排除一些障碍，未尚不是一种促进这门学科及早诞生的办法。

(二)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在这里提出一个设想：

及早对三级审稿这一编辑体制进行总体上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出版工作发展的新形势，同时也为开展建立社会主义图书编辑学的科研工作铺平道路。

所谓总体上必要的改革，包含了两重意义。其一，这几年我们曾经在编辑体制上作过一些改革，如实行编辑工作定额责任制和奖惩办法，试行编、印、发一条龙的合同制等等，不能说这些局部改革没有成效，但它们还没有从总体上突破年深日久的三级审稿的编辑体制。其二，许多事实说明，这个体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为开创出版事业新局面而进行的实践，有必要从总体上考虑如何进行改革。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当初，建立这样一个三级审稿的编辑体制，其用意无疑是为了加强领导，把好审稿关，保证编辑工作的质量，特别是保证出版的图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承认，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实行这一体制，对提高图书质量、发展出版事业是取得了良好效果的。“文革”以前，在三级审稿的体制比较正常地实行的时候，许多出版社确实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高水平的图书。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出版任务，例如一系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文集的出版，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巨著的问世，都是超过前代的盛举。对这些主流方面的成就，应该作出足够的估价。当然，建立三级审稿的体制，也包括了防止发生各种差错这样的要求，智者千虑，尚有一失，一名编辑，再高明也难免有疏忽大意或学识见解不到之处，在他上面，多两道关口，力争把书稿出现差错的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做好编辑工作的一个基本保证。问题在于，在那些年月里，在频繁不

断的政治运动中，如果编辑图书有一点疏忽大意，就会酿成政治性错误，当事者也会遭致种种不幸。在这种情况下，审稿者往往会偏重于防范编辑工作有意无意地犯政治性错误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和把关。这就不免使三级审稿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作用。

对编辑部门的领导人员来说，他为了履行职责，防止编辑工作中出现政治性错误，他就很容易奉行当时那些“左”的观点与作法，在一般情况下，他常常表现为谨小慎微；而当政治运动到来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会对书稿进行过分的挑剔，把一些构不成错误的“错误”强加于书稿或个人。由于他处在领导地位，他对书稿的处理意见，编辑理应听从和执行。在这情况下，编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免受到一定的压抑。就是在业务知识方面，领导人员也并不绝对地比编辑人员高明，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书稿，领导人员不可能象责任编辑那样比较熟悉与理解，也不能象责任编辑那样精确地去进行审读加工。这是图书编辑工作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一大特点。于是，问题就发生了。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不是经常有这种现象吗？某部书稿，领导人员一时作不出决断，就会搁置下来，长期“研究研究”；或者当领导审稿的意见与编辑不一致时，即使编辑的意见比较正确，编辑也很难不听从领导的指示。更多见的现象则是如果因上下意见不一致而又未能妥善解决，这部书稿就常常被否决，不予编辑出版了。本来，在编辑部门，负责审稿的领导人的主要职责是从书稿的总体质量上（包括政治上的是否正确）审阅鉴定是否达到了出版水平，如果因为怕犯政治错误，防止在字里行间捅出什么漏子，因而逐章逐节、逐句逐句地去

重复编辑的全部职能，而如果他所查出来的“错误”，其实并不一定算是什么错误；这样，势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样的把关审稿，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加强领导的作用。

处于被领导地位的责任编辑呢，既然他尽心尽意编辑加工处理完毕的书稿，要由上两级领导来决定命运，他的心理状态上，就会形成一种“听命于上”、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感觉。作为责任编辑，他只能尽责于自己的加工处理，而不能尽责于这部书稿的能否定稿出版。久而久之，他只好习惯于服从这种既成局面。如果碰上了一些水平、经验、责任心都不怎么强的编辑人员，因为反正有上面两级领导去判定书稿的命运，他在处理上马虎潦草一点也就无所谓了。怀着这种“松散感”去工作，又怎么会保证编出的书稿质量完全符合出版的要求呢！总之，“无能为力”的情绪也罢，“松散马虎”的态度也罢，都是图书编辑工作严肃性的大敌。

以上所说的情况，当然不是全面的概括，也不是到处都一样。但是，应该承认，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更为常见多见。那时候，《两报一刊社论》之类的小册子，几乎取代了千百种出版物。一本书出了政治“问题”，作者、编者都要被问罪。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会有具有新意、新观点、新水平的图书出版。

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在有些出版社，三级审稿制常常徒具形式。由于可想而知的的原因，领导人实在不可能一一审读全部待决的书稿，二审、三审常常是很粗糙了事的，甚至只消领导人签个字就算审阅通过了。这时，如果恰恰有一部存在着这样那样错误的书稿，领导人怎么能去发现

错误？他的签字通过却为有错误的书稿开了绿灯。从这种情况看，即使是更多级审稿制也不能完全合乎理想地实现加强领导的目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英明地决定，再也不搞任何政治运动了。在出版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当图书编辑的人，精神上卸下沉重的包袱，工作积极性提高了。随着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出版战线上的许多有志之士高瞻远瞩，开始了为开创出版事业新局面的多方面努力。这从近几年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与发展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在编辑部门，由于三级审稿的体制并未改变，在人们精神上造成的消极影响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制度的弊端对实际工作的牵制则更为明显。至少，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还是继续存在的，那就是许多出版社编辑部门的工作效率始终未见提高，一部书稿从制定选题到审读处理到最后通过要周转一个很长的时间，“齐、清、定”的要求无法保证，书稿常常到上机印刷前还要推敲字句，修改清样，其实这种修改并无必要。说穿了，除了工作作风的原因，无非还是怕犯错误的心理在作怪。从全局来看，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不少闯出了新局面的先进出版单位，对全国出版事业的发展起了带头促进的作用；但是，多数的出版单位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这在一个省来说也是如此。不少出版社在编辑工作上缺乏雄心壮志，没有战略性的规划与决策，长时期来，出版的图书路子不广，质量不高，流于平庸，未能形成自己的优势与特点。这些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明知自己的工作，本单位的业绩，和先进单位、先进地区有着差距，也想改变落后的局面，赶上前去，可是常常心有余而力

不足，难以摆脱困境。而另一方面，有的出版部门由于三级审稿实际上做不到，致使一些不好的图书也公然问世。所以如此，原因很多，其中，三级审稿这个体制留下来消极影响，恐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了切实加强对图书编辑工作的领导与“把关”，使编辑部门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创新、开拓的精神，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为了使编辑的领导人能够高瞻远瞩，富有胆略与魄力，实施正确的领导；也为了使编辑人员能够放开手脚，创造性地投入工作；一句话，为了使出版事业能够做到与新形势、新潮流同步前进，应该及早从总体上改革三级审稿体制。

(三)

怎样从总体上改革三级审稿的编辑体制呢？

首先要更新观念。就是说，在审稿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要消除余悸，改“防”为“促”。

改革先要从领导开始，并由领导来切实抓紧抓好，所以先要从上而下地改变观念。

改“防”为“促”，意思是，把带有消极作用的“防范”改为富有积极意义的“促进”。促进什么？促进编辑人员在适宜他独立发挥才智能力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做好本职工作。编辑部门领导人员，应该头脑清醒地审时度势，要看到，近一、二十年来，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发展很快。新的思想、理论与知识，层出不穷，新的学科纷纷诞生，因而图书选题的内容大大地丰富了。对编辑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领导人员的学识水平，即使很为高明，也不可能

把众多编辑们处理的各类书稿，统统拿来由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把关审定，决定命运。这样做，不仅精力不允许，个人的素养也是力不能及的。归根到底，编辑图书的任务，主要是依靠编辑们的辛勤劳动来完成的。编辑领导工作的主要职责，在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领导制订工作规划，组织全体编辑人员贯彻执行到工作中去，同时，要尽一切可能为编辑们提供可以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条件，鼓励他们高质量地完成编辑计划；及时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帮助编辑解决工作中的困难。

改“防”为“促”，也就是说，把那种唯恐字里行间出现什么漏洞的消极思想改为放手让编辑们独立工作，促使他们从政治上到业务上认真地负起责任来的思想。要让编辑个个都能消除余悸，以高度的责任感编出高质量的图书来。防止编辑工作中出现重大差错，根本的办法是培养、使用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业务水平的合格的编辑人才，相信他们能够遵照党的方针、原则办事，负责地把工作做好。如果使用政治、业务水平不高、素质很差的人当编辑，再防范严密也不可能保证不出差错。只有让编辑部门拥有了合格的人才，形成了高度负责而又富有创造性劳动的气氛。编辑人员都能自觉地负责地独立工作，那么，不仅编辑个人能够异乎寻常地发挥出智力才能，整个编辑部门的能量也将会成倍地涌现出来。观念上破旧立新以后，从上而下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体制本身的改革就好办得多了。

其次，要改革制度，是否可以这样设想：把编辑部门的三级审稿制改为以编辑为中心的两级分工负责制。这里的两级，是指出版社设不管编辑业务的社长，总管行政，与此平

行，编辑部门则设总编辑（或编辑主任）和编辑两级，分工负责全部编辑工作。

以编辑为中心，就是说，在编辑部门的整个活动中，让编辑真正成为主要的力量，让他们名符其实地拥有独立工作、对分工编辑的每部书稿负完全的责任。从草拟确定选题计划、联系组织作者、对书稿进行审读加工，到最后定稿签发付印，授权责任编辑统一负责，而且负责到底。一部书稿，从选题到出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不可脱节的全过程。由于当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层次、多方面地发展，图书编辑工作越来越具有专业性，编辑要胜任自己的工作，一定要根据任务的要求，特别注意学习，要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方针政策，学习语文逻辑，还要善于学习吸收有关的专业信息与知识，才能在编辑工作的全过程一贯负责到底，把书稿高质量地编好，达到出版水平。这样的责任，毫无疑问，其他人，包括编辑部门的领导人，都是无法代替的。

建立制度就是为了确定某种责任。既然各部书稿都必须由分工的编辑来总负其责，那么，在编辑部门确立以编辑为中心的体制，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了。当编辑部门领导人认真抓起了全局工作，把编辑图书的责任放给编辑去承担，编辑人员则放下了过去背过的那些思想包袱，有可能富有创造性地从事工作；再加上适当的奖励政策，怎么能不调动起编辑人员的积极性？又怎么能不使编辑部门象一潭活水那样活跃起来，充满争出高质量图书的创新气氛？

当然，以编辑为中心并不是说不要领导把关了。代替三级审稿的“两级分工负责”，就是指在确立以编辑为中心的同时，编辑部门仍然要设若干名主管编辑的领导人员。这些

领导人仍然分工担负着领导与审稿的责任。不过这种责任不同于以往的三级审稿制。当书稿的编辑全过程统由编辑负责之后，编辑部门领导人的职责将主要地放在宏观决策上，放在全局筹划上，放在选题计划的研讨与审定上，放在全盘工作的组织协调上，以及对整个编辑工作进程的检查促进上。对于书稿，他当然要进行鉴定性审读，并就编辑提出的疑难问题和编辑进行商讨，但总的来说，他不必要去干涉每名编辑对每部书稿的日常编辑活动，不必把书稿的决审权统统抓在自己手里。他应该关心每一部书稿在政治上是否正确，但不等于事必躬亲，从头到尾去审读处理一部书稿。凡是学术性问题要按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可求同存异，开展讨论争鸣，而不是用过去的那些框框条条来对比硬套，随意否决。遇到专业性很强的书稿，为了鉴定其学术水平究竟如何，领导的责任是帮助编辑采取适当的方式，如约请内行的专家们集体审读书稿等办法来审定书稿的学术水平。

改革后的这种以编辑为中心的两级分工负责制，最大的好处是，上下职责分明，减少了审读书稿的层次，省掉了许多繁琐的手续，也节省了时间。整个编辑部门的工作集中于高质量地高效率地编好图书。既有战略性的规划、全局上的指导，又有日常业务的主动性、连续性和创造性，个人的和集体的能量，都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对于出版、编辑事业的加强领导，开创新局面，不断取得新发展，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围绕以上两个要点，还有一系列相关联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最重要的是必须实行新的人事制度。

实行以编辑为中心的两级分工负责制，一个先决条件是

出版社的编辑部门是否拥有足够的编辑人才？甚至可以这样要求，编辑部门必须拥有一批高水平的编辑家。如果还象以前的有些单位那样，在编辑工作人员之间，既无区别，又无考核，反正进了编辑部门的都是编辑，也不论他能否编书，是否具有编辑的学识水平，也不论他有没有编成过有质量的图书，反正也都具有编辑的资格。这种混乱状况是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编辑体制，根本改变编辑工作面貌的。

编辑部门要拥有足够数量的、胜任于工作的编辑人才，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考核和更新等一系列工作。改革以往那种由人事部门统分统调的做法，结果常常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专业不对口，占了编辑而编不出好书等等不正常现象。

有一些相应的原则应该明确起来。

编辑，既是行政职务，也是学术职称，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重要的在于，既然设立了职权相当的编辑职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应该是完全能独立地工作胜任于工作的人才，任命编辑必须经过相应的考核，必须在政治上、业务上具有合格的水平，并有社会主义道德修养的人才。决不允许滥竽充数的现象继续存在。

当一位编辑被安排到这个岗位工作以后，就应该树立他的权威地位，支持发挥他的权威作用。要为每一名独立工作的编辑配备相应的包括助理编辑、编务工作人员等在内的辅助工作人员。按照编辑选题计划的分工，编辑和他周围的辅助人员形成一个为完成所分工的计划而各在其位各司其职的集体。对各项辅助工作要分别建定工作指标和责任守则。

论资排辈之类的流弊必须肃清。凡是有才干，能胜任担